

从重西北到重西南:清朝围绕治藏的筹边方略^①

陈鹏辉

[摘要] 清朝前期统一西北疆域至为重要,西藏对西北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西北边疆战略的重心。清朝奉行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方略,不仅是重要的治藏方略,亦是统一、治理广大西北地区的重要方略。晚清以降,西南边疆危机日益凸显,西藏对西南边疆的战略价值凸显。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清廷推行藏事改革,以巩固西南边疆安全。清末藏事改革体现出清朝以西藏为西北、西南边疆轴心的战略重心由西北转向了西南。

[关键词] 清朝;治藏;西北边疆;西南边疆;重心转变

[中图分类号] K249+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8)03-0125-09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然而清朝前期在推进统一西北准噶尔的进程中,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诸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现实,因势利导地采取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方略。此方略将西藏与蒙古诸部分布的广大西北边疆地区紧密相联,体现出西藏是西北边疆战略重心的特点。晚清以降,西南边疆危机不断加剧,西藏对西南边疆安全的战略屏障地位日益凸显。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清廷推行藏事改革,以巩固西南边疆安全。清末藏事改革体现出清朝将以西藏为西北、西南边疆战略的重心由西北转向了西南,这一着眼于西藏边疆地缘关系的重大转变,使西藏回归到了其作为西南边疆安全天然屏障的实际,对当今边疆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清朝围绕西藏的边疆战略问题是清代西藏史、边疆史等研究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内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②然而现有成果较多关注于清朝治藏及治理西北、西南边疆的政策与具体措施,对西藏在清朝西北、西南边疆战略中的地位及其变化未有深入探讨。本文利用《清实录》、相关廷臣疆吏的奏牍等资料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以抛砖引玉,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清末民初中央政府治藏研究”(项目编号:16XZS033)的阶段性成果。

② 从清朝边疆治理角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马汝珩、赵云田:《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简论》[J],《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赵云田:《清代前期统治西北地区的政策和措施》[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等等。从清朝治藏政策角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顾祖成:《清朝前期治藏政策述略》[J],《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彭建英:《试论清朝的治藏方略》[J],《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永红:《清代治藏政策的特点及其演变》[J],《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等等。

一、清朝前期西藏在西北边疆战略中重心地位的确立

(一)尊崇格鲁派及西藏在西北边疆战略中地位的莫立

17世纪上半叶,宗喀巴创立于15世纪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后来居上,与助其从与西藏各派势力斗争中胜出的和硕特蒙古固始汗部,建立了蒙藏上层联合掌政的甘丹颇章政权。不仅如此,其在广大蒙古地区形成了“其势有不能禁者”^①的重要影响,蒙古上层“惟喇嘛之言是听”^②，“凡决疑定计,必咨于喇嘛而后行”^③。缘此,崛起中的后金对格鲁派重视有加。如皇太极“遣察汉喇嘛等致书图白忒汗”,邀请西藏地方选派高僧前去“宣扬佛教”^④。同时,为笼络蒙古诸部,后金统治者注意借助格鲁派在蒙古诸部的宗教影响。如努尔哈赤在其根据地赫图阿拉城东,兴建七座大庙,明确表示尊崇藏传佛教;皇太极征服察哈尔之后,下令修建实胜寺,并将内蒙古的护法神像移至沈阳供奉,“以示尊崇”等。后金统治者尊崇格鲁派,不仅为顺治朝西藏和平归附奠定了基础,也为统一漠南蒙古以及喀尔喀蒙古起到了积极作用。

1644年,清军入关后,福临在北京举行即位大典,标志着后金政权发展成了全国性的中央政权。1652年西藏地方五世达赖喇嘛赴京朝觐,次年清朝以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与固始汗的方式实现了西藏和平归附。此后,西北的准噶尔蒙古成了清朝推进大一统的最大障碍。17世纪中叶后,噶尔丹逐步统一卫拉特蒙古,建立起了雄踞西北的准噶尔政权,与清朝分庭抗礼。为实现复立蒙古帝国的目标,准噶尔试图控制西藏,欲“挟制达赖喇嘛而号令众蒙古”^⑤。由是,康熙、雍正在推进统一西北疆域中,继续奉行尊崇格鲁派的方略,绝不容许格鲁派领袖为准噶尔所利用。一方面,采取册封等措施,加强扶植格鲁派。康熙帝除正式册封后藏的班禅额尔德尼外,还册封蒙古地区的格鲁派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呼图克图,“以示尊崇”。雍正即位后宣布“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听,故欲约束蒙古人,则喇嘛之教亦不可轻弃”^⑥。雍正初年,专程从库伦赴京叩谒康熙帝的哲布尊丹巴在京圆寂,雍正亲往祭奠,并照达赖、班禅之例,“给赐名号印册,以示优典”^⑦。康熙、雍正时期虽未完成统一西北准噶尔,但奉行尊崇格鲁派的方略,不仅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亦为设置西宁办事大臣,将青海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统辖之下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康熙、雍正时期采取“逐准安藏”方针,不容准噶尔的阴谋得逞。1705年康熙帝分析策妄阿拉布坦试图劫持第巴桑结嘉措所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用心时指出:“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皈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为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因此,“特遣席柱等前去”^⑧。雍正时期,准噶尔多次袭扰喀尔喀蒙古,“觊觎抢夺”喀尔喀“普同供养”的大活佛哲布尊丹巴,试图以此挟制喀尔喀部。对此,雍正下旨将哲布尊丹巴移至多伦诺尔,使得准噶尔“失意空还”^⑨。1727年卫藏战争时,为防止准噶尔乘机挟制七世达赖喇嘛,雍正帝下旨将其移至理塘,并派兵守护^⑩;后就在藏留驻清军,雍正明确指出:“西藏驻扎弁兵,本为保护唐古特人等,以防准噶尔贼夷侵犯而设。”^⑪总之,清朝前期为确保西藏稳定所采取的

① 福格:《听雨丛谈》卷7《喇嘛》。

② 《清世祖实录》卷68[Z],顺治九年九月壬申。

③ 《(乾隆)皇舆西域图志》卷39,《风俗·准噶尔部》。

④ 《清太宗实录》卷49[Z],崇德四年十月庚寅。

⑤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⑥ 《雍正上谕内阁》[Z],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

⑦ 《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丙申条。

⑧ 《清圣祖实录》[Z]卷227,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乙巳条。

⑨ 《清高宗实录》[Z]卷110,乾隆五年二月甲午条。

⑩ 《清世宗实录》卷145,雍正十二年七月癸巳条。

⑪ 《清世宗实录》卷129,雍正十一年三月壬午条。

“逐淮安藏”,被迫将西藏与西北边疆战略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综上,康熙、雍正及乾隆前期尊崇格鲁派的方略,已比较清晰地显示出西藏在清朝整个西北边疆战略中的重心地位。

(二)统一准噶尔及西藏在西北边疆战略中重心地位的确立

乾隆帝最终统一西北疆域并确立了西藏在西北边疆战略中的重心地位。乾隆即位后明确指出:“达赖喇嘛在国初导诸藩倾心归命,其功最巨”,^①“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因是尊崇,为从俗从宜计”^②。在用兵准噶尔时,乾隆指示:“准噶尔人等向知尊崇佛法,朕特为广布黄教,在伊犁设立库伦,宣诵经典,俾群生咸知敬奉。”^③随后又指示:“蒙古等尊奉黄教,固勒扎系伊犁善地,理宜重修庙宇,遣大喇嘛前往诵经。”^④由于采取这些措施,清军在平定准噶尔及回部中,伊犁一些有影响的大喇嘛给予了积极配合。总之,在乾隆帝最终完成统一西北疆域中,尊崇格鲁派起到了积极作用。

平定准噶尔后,乾隆帝向卫拉特蒙古各部上层表示“蒙古向敬佛,兴黄教”;^⑤并下令在承德“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修建普宁寺,后又饬令在承德仿照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供蒙古王公朝觐时瞻仰,以示优崇。在治理西北边疆中,乾隆指示伊犁将军明瑞“自应照蒙古例设立喇嘛”,修建寺庙,举行佛事;^⑥并“着由京选派副大喇嘛、苏拉、喇嘛各一名,前往伊犁教训厄鲁特喇嘛人等”^⑦。1793年乾隆帝在《御制喇嘛说》中正式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⑧,此番对清初以来尊崇格鲁派以笼络蒙古的方略的总结,标志着西藏在清朝西北边疆战略中重心地位的完全确立。

由上可知,清朝前期西藏在西北边疆战略中重心地位的逐步确立,突出体现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方略。清朝这一融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及边疆政策于一体的基本方略,始终是将治藏与统一、治理蒙古诸部分布的广大西北地区紧密相连的,不仅是重要的治藏方略,亦是统一、治理西北边疆地区的重要方略。魏源对此评价道:“(广大西北地区)皆黄教,使无世世转生之呼毕勒罕以镇服僧俗”,“盖边方好杀,而佛戒杀,且神异能降服其心,此非尧、舜、周、孔之教所能训也”,“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⑨总之,清朝事实上遵循了“卫藏安”才能“西北安”,而“西北安”对国家统一、稳定至为重要的战略思路。

清朝前期之所以逐步确立西藏为西北边疆战略的重心,根本原因在于统一西北准噶尔是实现大一统的既定目标,而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准噶尔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作为格鲁派中心的西藏对清朝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经乾隆帝确立后,西藏作为西北边疆战略重心的地位成了清朝的祖宗定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如,嘉庆宣布:“因众蒙古崇奉喇嘛,最信黄教,因而加以保护,用示怀柔。”^⑩清宗室昭槱亦言:“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祇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⑪清末之际,驻藏帮办大臣桂霖指出:“查藏部本属羁縻,当年不惜劳费。竭力经营者,非倚屏蔽川疆,实藉以牢笼蒙古。”^⑫清朝以西藏为西北边疆战略的重心,奉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方略,不仅对驾驭广大蒙藏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亦加深了蒙古族、藏族等融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

① 乾隆:《重修黄寺碑文》。

② 《清高宗实录》卷1427,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巳条。

③ 《清高宗实录》卷490,乾隆二十年六月庚戌条。

④ 《清高宗实录》卷517,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癸未条。

⑤ 乾隆:《普宁寺碑文》。

⑥ 《清高宗实录》卷678,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庚申条。

⑦ 《清高宗实录》卷680,乾隆二十八年二月甲午条。

⑧ 《清高宗实录》卷1427,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巳条。

⑨ 魏源:《圣武纪》[M]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

⑩ 嘉庆:《普陀宗乘之庙瞻礼纪事诗》。

⑪ 昭槱:《嘯亭杂录》[Z]卷10《章嘉喇嘛》。

⑫ 王彦威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Z]卷197,1933年,第7页。

值得指出的是,清朝前期将西藏确立为西北边疆战略重心,也有借助格鲁派笼络蒙古诸部以反击沙俄侵略西北边疆的用意。^①同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有将西藏视为西南边疆屏障的考虑,如康熙帝指出:“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②尽管清朝以西藏为西北边疆战略的重心,过分尊崇格鲁派的方略也有一些弊端,但从统一、治理西北边疆的战略角度而言是成功的。

二、清中叶以后西藏对西南边疆安全的战略地位凸显

鸦片战争后,英俄等国分别勾结新疆的阿古柏反动势力,图谋侵略西北,但左宗棠收复新疆及新疆建省,粉碎了沙俄等国的企图,加强了中央对新疆的统辖,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然而,清中叶以后西藏边疆危机日益加剧,对清朝的西南边疆安全提出了严峻考验。

(一)西藏边疆危机加剧及其在西南边疆安全中的地位凸显

1793年清朝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全面加强了中央在藏主权与治权,确保了其后半个多世纪的西南边疆安全;然而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朝国势衰微,西藏边疆危机日益凸显。

其一,英俄竞相侵藏。英国为实现其“北上”战略目标,一步步地蚕食侵吞了本属清朝藩属的喜马拉雅山南麓与西藏毗邻的尼泊尔、锡金(哲孟雄)、不丹(布鲁克巴)后,加紧侵略西藏。1876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烟台条约》,据其中的“西藏专条”取得了英人入藏游历、探险的特权,从此打开了中国西南边疆门户。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为实现其“直叩印度的大门”^③的目标,企图“以西藏据印度之巅峰,故思得藏以图印,以取建瓴之势”^④。随着英俄竞相侵藏的深入,西藏边疆危机不断加剧。

其二,西藏地方内讧不断,政局不稳。由于晚清以降驻藏大臣履职渐趋松弛,西藏地方“私相械斗,弱肉强食,不听约束,不服公断,聚众哄堂,轻侮官长之事”^⑤时有发生,其中导致政局不稳的内讧就有如“哲蚌寺布施事件”“甘丹战争”“第穆事件”等。此外,第九至第十二世达赖喇嘛都短命而亡,其实“这几世达赖都是作了僧俗大农奴主争权夺利的牺牲品”^⑥。

其三,驻藏大臣庸儒无能、贪污腐败。一些驻藏大臣“久为藏番所轻,竟至威令不行”^⑦，“藏政不修，而深责藏员顽固不化”“一切政权得贿而自甘废弃”。在应对英俄等国侵略上，“只见其(驻藏大臣)挟英以要藏，未闻挟藏以拒英”^⑧等等，以致“达赖喇嘛谓中朝不知用人，无足依赖”^⑨。尤其是英国两次侵藏战争中驻藏大臣升泰、有泰等的“颛预误国”，导致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与驻藏大臣关系恶化，进而对清中央政府强烈不满的严重后果。

西藏是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西藏地方危机的加剧，尤其是英俄等的侵略日甚一日，危及整个西南边疆安全，由此西藏在西南边疆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任川督丁宝桢就洞悉此一情势并提出了“固川保藏”^⑩的战略构想，然而清廷内外交困、无力西顾，其建议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如此，此后清廷内部虽也有一些加强西藏边防的筹议，但直到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

① 参见马衍汝、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第139—140页；《准噶尔史略》第70—78、88—96页等。

② 魏源：《圣武纪》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③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42页。

④ 鹿传霖：《瞻对收复请撤回番官并陈英俄窥藏情形疏》，见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鹿传霖藏事奏牍》[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017页。

⑤ 文硕：《会奏会议边防酌拟大纲折》，见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文硕驻藏奏稿》[Z]，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563页。

⑥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⑦ 鹿传霖：《密陈西藏情形可虑折》，《清代藏事奏牍·鹿传霖藏事奏牍》第975页。

⑧ 吴丰培：《纳钦驻藏奏稿疏》，《清代藏事奏牍》第965页。

⑨ 吴丰培：《文硕奏稿疏》，《清代藏事奏牍》第699页。

⑩ 详细论述参见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争时,仍未有实际行动,西藏边防因此长期处于松弛状态。

继丁宝桢后,川督鹿传霖等人也提出了“保川固藏”的建议。1896年,鹿传霖围绕瞻对问题,向清廷提出“西藏地方与四川唇齿相依,关系甚重”^①，“一旦弃归藏中……川省且无门户可守,危亡可立而待……不能不及早图维,预筹布置,以弭后患也”^②，“且英俄交窥藏地,隐而未发,我若力促制藏,英甚愿藉藏为我属,公法两不相侵为辞,因以拒俄。则蜀尚有藩篱可恃,藏或可保暂安”^③。随后,鹿传霖奏请“统筹川藏情形,瞻对亟宜改设汉官,以顺民心而固边圉”^④。对鹿传霖的建议,高燮曾侍御等人上奏表示支持。如他奏陈“固川疆即以安藏境”,建议在理塘、巴塘、江卡、察木多等处,安设台站粮员,“俾川藏两境联为一气”^⑤。再如给事中吴光奎奏陈“里塘、巴塘一带为四川入藏门户,请于该处设立汉官”。对这些建议,清廷起初认为“系为豫杜窥伺起见”“洵于时局有益”,^⑥着鹿传霖与驻藏大臣等“会商妥办”,但最终决定“事多窒碍,即着毋庸置议”^⑦。

清廷对鹿传霖“保川固藏”的建议批示:“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筹善后,设流官,此保川之计,非保藏之计也。叛则诛之,服则抚之,已给之地不索还,已授之官不更易,隐示达赖以兵威,而不使藉口生衅,此保藏而并保川之计也。”^⑧就在清廷试图寻求两全其美之策,酝酿是否采纳鹿传霖的建议的关键时刻,先前支持鹿传霖的文海与成都将军恭寿,“二人受到藏人重贿,奏请将瞻对仍还藏管辖”^⑨。文海态度的逆转,使本来犹豫不决的清廷决定放弃收回瞻对。清廷训诫鹿传霖等:“从来办理边疆重务总以持平稳慎为主”,批评其“偏执己见”。^⑩1897年12月2日,清廷下旨将“所有三瞻地方,仍着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管,毋庸改土归流”^⑪。此一决定表明,经过近两年的反复酌量,清廷仍未能跳出传统的治边方略。不过,围绕“瞻对问题”的讨论及西藏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促使清廷加深了对西藏在整个西南边疆安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为稍后筹边思路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二)西藏在西南边疆安全中的重要性引起清廷重视

随着英俄等国侵藏加剧以及川边各处土司内斗不断,不断有人建议清廷经营川边以加强西藏边防,这些建议敦促清廷逐步接纳了“藏卫者,川滇之屏蔽也”的重要认识,由此清廷的边疆战略随之逐步转变。

1899年8月10日,宗室昆冈、会章与裕德、清锐等重臣联名奏呈《统筹藏务折》,在深刻分析“强邻迫胁,设有动摇,关系匪浅”的“时局艰难”后,提出:

臣等所以鳃鳃过虑者,当此应请密飭驻藏大臣设法固结其心,启发其愚,仍将一切事宜,和衷商酌,及时兴举,勿再因循观望。并请密飭川、滇督抚臣,统筹全局,同力维持,勿稍推诿歧视,使晓然知朝廷之所以固藏卫者,即所以固川滇也,亦即所以预弭衅端也。抑臣等更有请者,达赖喇嘛自输诚以来,垂三百年矣,此次可否特颁温谕,将休戚相关之意,剴切宣布,俾得释其疑而安其心之处。^⑫

① 鹿传霖:《密陈西藏情形可虑疏》,《清代藏事奏牍·鹿传霖藏事奏牍》第974页。

② 鹿传霖:《派营官严防窜回并预筹收回瞻对疏》,《清代藏事奏牍·鹿传霖藏事奏牍》第981页。

③ 鹿传霖:《藏事奏牍序》,《清代藏事奏牍·鹿传霖藏事奏牍》第968页。

④ 鹿传霖:《统筹川藏情形瞻对亟宜收回改设汉官疏》,《清代藏事奏牍·鹿传霖藏事奏牍》第1002页。

⑤ 鹿传霖:《高燮曾侍御禀请收回瞻对建置汉官疏并请改设文武各员片》,《清代藏事奏牍·鹿传霖藏事奏牍》第1025页。

⑥ 《清德宗实录》[Z]卷392,光绪二十二年六月癸酉条。

⑦ 《清德宗实录》卷394,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条。

⑧ 《清德宗实录》卷396,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庚午条。

⑨ 吴丰培:《文海驻藏奏稿跋》,《清代藏事奏牍·文海驻藏奏稿》第1061页。

⑩ 《清德宗实录》卷410,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辛卯条。

⑪ 《清德宗实录》卷412,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条。

⑫ 《昆冈等奏统筹藏务折》(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4),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384页。

清廷随即谕令:着文海、裕钢传谕该达赖喇嘛,开导番众人等,因时制变,知己知彼,务释群疑而防后患。并将应办事宜和衷商酌,及时整顿,勿再因循贻误。藏卫为川、滇屏蔽,应如何未雨绸缪豫为防范之处,并著奎俊、崧蕃、丁振铎统筹全局,协力维持。勿得稍存观望,以期外绥藩服,内固边防。^①

此一决定表明,随着西南边疆局势的日益紧张,清廷开始认识到了西藏对于川、滇等西南边疆安全的重要性。

清廷做出经营川边的决定之所以如此慎重,前后历经20多年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难以突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祖宗之制,即难以跳出以西藏为西北边疆重心的传统边疆战略的束缚。对此,《统筹藏务折》中明确指出:“达赖喇嘛为黄教之领袖,尤为西、北两路蒙部番族所尊崇供奉者也”,“溯查达赖喇嘛自太宗朝遣使输诚以来,举北鄙西陲袤延二万余里之蒙部番族,靡然内附,丕成大一统之休,来享来王,远迈前古,于是列圣恩礼有加,令其世守藩封,屏翰边徼,为之建官列戍,布置固详”。显然,对于更改祖宗之制,昆冈等是非常慎重的,他们在深刻分析西藏及西南边疆的危局后,才谨慎地提出了“诚以藏卫者,川滇之屏蔽也”的重要谏言及相应对策。应当说,昆冈等的《统筹藏务折》标志着清朝围绕西藏的筹边思路开始发生转变,即由重西北开始转向重西南。

庚子之役后,1900年7月12日,清廷谕令军机大臣字寄理藩院、驻藏大臣、四川总督以及云贵总督等“妥筹全局”,明确指出:

西藏为川、滇屏障……朝廷顾念西陲,时深廑系。况藏卫为英、法所久涎,藏卫危则川、滇之屏蔽既撤,而黄教亦恐不能自存……即着理藩院、驻藏大臣传谕达赖喇嘛等,保守藏卫,严密防维。如敌人有意开衅,即着相机应敌,饷项枪弹等,亦着自行筹备。从前英法侵藏,曾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办兵饷,守护地方,朕甚嘉之。此次义声所动,度亦不难克期兴作也。

着奎俊、丁振铎慎守封疆,协力维持,勿得稍存观望,以固我边隅,兴我黄教。将此谕知理藩院,并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庆善、裕钢、奎俊、丁振铎知之。^②

此番部署表明,八国联军入侵后清廷在“变法图强”的整体运筹中,完全意识到了西南边防的重要性。由其中所强调的“藏卫危则川、滇之屏蔽既撤,而黄教亦恐不能自存”可见,在外敌入侵造成西南边疆危机空前之际,清廷更加正视西藏与四川、云南等的地缘关系,初步确立起了治藏与加强整个西南边疆安全紧密相连的战略思维。然而此时清廷已元气大伤,思想上的重视,并未在实践上立即真正行动起来。

三、清末西藏在西南边疆战略中重心地位的确立

(一)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清廷的筹藏部署

1904年英国第二次武装侵藏,英军开进拉萨及其逼迫西藏地方签订“拉萨条约”后,清廷迫于各方压力,终于开始了一系列筹藏部署。

第一,决定“查办藏事”。9月26日,即“拉萨条约”签订后的第19天,朝旨派唐绍仪“前往西藏查办事件”,^③次日即以唐绍仪的任命照会了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④,显然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向荣赫鹏宣布不承认非法的“拉萨条约”立场的。然而派唐绍仪入藏的决定是在荣赫鹏已率部离开拉萨3天后做出的,当时清廷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获悉消息。随后当获知英军从拉萨撤走后,经过与英方交涉,清廷改派唐绍仪等赴印谈判重订“拉萨条约”事宜,但由于英方坚持无理的侵略要求,谈判的外交斗争历时一年多,致使

① 《清德宗实录》卷448,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庚戌条。

② 《字寄庆善等八国联军入侵传谕达赖喇嘛保守西藏严密防维》(一史馆藏军机处上谕档)。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4),第1387—1388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534,光绪三十年八月癸亥条。

④ Alastair Lamb, *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86, p259.

“查办藏事”的计划拖后。

第二,在决定驻藏帮办大臣改驻察木多(昌都)的基础上,对加强经理“西藏各边”进行部署。10月3日,朝旨强调:“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豫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自固藩篱。前有旨令凤全移驻察木多,西宁办事大臣昨已简放延祉。”同旨具体部署:“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着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界一带着延祉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藩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目前所需经费,着会商崧蕃、锡良妥筹具奏”;同时责成相关人“尽心筹画,不避艰难,竭力经营,慎重边圉,用裨大局”。^①

第三,筹备收复三瞻。10月31日,朝旨指出:“有人奏:西藏情形危机,请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同时着锡良、有泰、凤全“体察情形,妥议具奏”。^②

由以上三旨环环相扣的接连部署可见,在西藏边疆危机空前之际,清廷开始了从加强西南边疆安全的宏观战略层面进行筹藏部署,即清廷的筹藏思路开始转向了重视西藏对西南边疆安全的战略价值。

以上部署在落实中,凤全在前往昌都途中,因在巴塘、理塘等地的一些改革措施偏激,引起了当地藏族寺院上层和土司头人的强烈不满,次年4月3日即遭戕害。“凤全事件”后,清廷对此前部署作了几点修改和完善。

第一,简放联豫为驻藏帮办大臣,并接受其“驻藏帮办大臣宜复旧制仍驻前藏”^③的建议,这即修改了原定驻藏帮办大臣移驻昌都的计划。

第二,决定收复瞻对。1905年10月6日,朝旨决定“将三瞻地方收回内辖,改设官屯,俾资控驭”,着有泰、联豫、锡良、赵尔丰等“通筹妥办”^④。收复瞻对的决定,进一步体现出清廷筹藏思路的转变。

第三,决定川边“改土归流”。1906年清中枢官员姚锡光在上军机处王大臣的“规划川藏说贴”中提出:“于川藏之交大小金川、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五大水域之中,以全力经营,比照西北边防各大臣或江北提督成案,姑设川西边务大臣或提督。”^⑤与此同时,川督锡良密折保荐建昌道赵尔丰为经营川边人选。8月22日,朝旨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令其“居中擘画,将一切开垦防练事宜切实筹办”,其驻地、所需经费等未尽事宜,着会同川、滇总督“通盘筹画”;同时强调指出:“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篱,实为今日必不可缓之举。”^⑥此举表明,清廷内部讨论了20多年之久的“固川保藏”,至此最终确定为川边“改土归流”。赵尔丰走马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推行“改土归流”以及经营藏东南,为随后的藏事改革提供了“以为声援”的有力支援与配合。

较之西藏为西北边疆战略重心的传统筹边思路,上述加强“西藏各边”、收复瞻对、川边“改土归流”,以及与英方的外交斗争等一系列部署,表明清廷已将西藏视为了西南边疆安全的屏障。

(二)清末藏事改革与西藏在西南边疆战略中重心地位的确立

1906年4月27日《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在北京签订,重订“拉萨条约”宣告议结,清廷立即转向落实原定“查办藏事”的计划。29日起,清廷连下三旨擢升随唐绍仪赴印与英方谈判的张荫棠为五品京堂候补,并赏给副都统衔,派往西藏“查办事件”。其中强调:“朕惟西藏地方关系至为重要……特命尔前往藏地查办事件。所有按约开埠事宜,亟应切实筹办。至藏中应行布置一切,并即悉心经画,随时详晰具

① 《清德宗实录》卷534,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条。

② 《清德宗实录》卷535,光绪三十年九月戊戌条。

③ 《清德宗实录》卷549,光绪三十一年九月癸酉条。

④ 《清德宗实录》卷549,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戊寅条。

⑤ 姚锡光:《筹藏刍议》(全一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见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二函,线装本)[乙],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叶六。

⑥ 《清德宗实录》卷562,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戌条。

奏。”^①张荫棠对西藏的战略地位有清醒的认识,早就形成了西藏是整个西南边疆安全屏障的筹边思想,如尚在印度时他就指出,西藏“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②。他到藏后,在惩治腐败、整饬吏治的基础上,倡言革新、筹划新政,大刀阔斧地掀起了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外事以及民俗等的全面改革,后世史家一般称之为“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张荫棠以收回政权根本宗旨的藏事改革,对抵御侵略、维护主权与加强中央在藏治权起到了积极作用,标志着清朝以西藏为西南边疆安全屏障的战略部署取得了一定成效。

1907年6月间,正当张荫棠深入推行藏事改革的关键之际,清廷派其赴印与英方谈判《中英藏印通商章程》事宜,他再次转向了维护主权的外交斗争。不久,驻藏大臣联豫奏请“速简经济夙优,声名素著大员”前往西藏,“渐图补救”,并加强“西南北一带地方”^③的治理。同年底,张荫棠结合藏事改革实际及此前一系列的规划,向清廷奏呈了其藏事改革总体性规划的“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条”(以下简称“十六条”)。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正在赴京朝觐途中,清廷认为这是加紧推进藏事改革的有利时机,于是进一步地调整部署。

1908年3月6日,清廷赏给赵尔丰尚书衔,作为驻藏办事大臣,仍兼边务大臣^④,以便其将边务、藏务会同川、滇督臣“通盘筹画”。3月9日朝旨强调,赵尔丰“特加崇衔,以重事权”,同时为使川藏“联络一气”,四川“作为西藏之后援”,同时调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以免扞格,而便联络”,并勉励其兄弟二人“合衷筹办,共济时艰,用副朝廷绥固边陲之至意”,同旨要求“即责成赵尔丰会同联豫察度情形,将藏中应办各事通盘筹画,详拟章程,次第奏请施行”^⑤。3月11日,朝旨强调“朝廷顾念西陲紧要”,以上人事安排“以期固我藩篱,与寻常委任不同”,同时作了两点具体安排,一是财力上,“复着度支部岁拨银五六十万两以应要需,又责成四川总督无分畛域,随时接济,所需人员亦优加体恤。总期饷糈无缺,实力充足,诸事应手”;二是赵尔丰的驻扎地方,“俟到藏后察度情形酌量择定,只可居中调度,亦无需疲于奔走。遇有重要事务,不妨按时巡查,亦不必一周历”。最后该旨强调:“西藏为川滇屏蔽,藏务即是边务,如西藏布置完固,川滇边务自开松简”。^⑥4月3日,清廷对张荫棠的“十六条”批示道:“颇多可采”,着赵尔丰、联豫等“随时奏明,请旨办理”,^⑦这即将张荫棠的“十六条”确定为藏事改革的纲领,为落实以上三旨调整加强性的部署提供了遵循。

上述部署,在后来落实中,赵尔丰虽未能实际就任驻藏大臣,但其继续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及经营藏东南,同样对巩固西南边疆起到了积极作用。联豫推行改革的个人才能虽遭后世史家批评,但其毕竟在张荫棠所开启的基础上继续推行藏事改革,直至辛亥革命爆发。

综上,由于西藏对西南边疆安全的战略价值凸显,上述清廷一系列的筹边部署完全体现出将西藏与西南边疆紧密相连的思路。如果说1904年派唐绍仪入藏“查办事件”时,清廷这种转变意图还不明确,后来派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加强“川藏一体”的部署,则完全体现出将以西藏为西北、西南边疆战略的重心地位,由重西北转向了重西南,其中藏事改革,收复瞻对以及川边“改土归流”是清廷围绕西藏的筹边思路转变所取得的突出成效。

值得指出的是,清末藏事改革体现出西藏在清朝边疆战略中的重心地位由西北转向西南的同时,也体现出重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变化。早在1884年,七品京官陈炽就提出了“通商、惠工、开屯、劝学”等“开发”西藏的建议,结果清廷裁定“西藏地处极边,素崇佛教,言语不通,文字不同,一旦改弦更张,

① 《谕张荫棠查办西藏事件》(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4),第1511页。

② 张荫棠:《致外部丞参函详陈英谋藏阴谋及治藏政策》,《清代藏事奏牍·张荫棠驻藏奏稿》第1306页。

③ 联豫:《遵旨复岑春煊奏陈统辖西北全局折》,《清代藏事奏牍·联豫驻藏奏稿》第1498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587,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庚申条。

⑤ 《清德宗实录》卷587,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癸亥条。

⑥ 《清德宗实录》卷587,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乙丑条。

⑦ 《清德宗实录》卷588,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戊子条。

恐求其治而反速其乱,陈炽所奏各节碍难议行”^①。但在清末筹藏之际,随着各类筹藏建言的不断提出,“开发”西藏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其中,1906年,姚锡光批评清朝治藏“统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以致“只巴、里两塘,拉萨都会尚略具规模”,^②建议推行兵屯民垦等“开发”措施,这就为清廷采纳张荫棠一系列发展实业的规划提供了思想准备。张荫棠藏事改革期间,会同联豫饬立的“九局”中的“农牧局”“工商局”“路矿局”“盐茶局”“学务局”等,对推动近代西藏各项实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之,清末藏事改革体现出清朝治藏由传统的注重“统驭”,向重视开发充实的转变。

四、结语

清朝前期统一西北疆域至为重要,西藏对西北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清朝的治藏方略体现出重西北的特点;统一准噶尔后,西藏对西北边疆战略价值的主要使命已实现。晚清以降,西南边疆危机日益凸显,西藏对西南边疆的战略价值地位凸显,清末筹藏思路由此转向了将西藏与西南边疆紧密相连。尽管此一转变缘于应对西南边疆危机,体现出很大的被动性,但毕竟回归到了西藏与西南边疆地缘关系的实际,即西藏作为西南边疆安全天然屏障的应有地位,这对当今的边疆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需要指出的是,西藏在清朝西北、西南边疆战略中的重心由重西北向重西南的转变,与西藏紧密关联的经济重心由西北转向西南密切相关。清朝前期西藏在西北边疆战略中重心地位的确立,是以西北“茶马贸易”的兴盛为经济基础的。清中叶以降,西北“茶马贸易”逐步衰落,西北地区与在西藏经济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下降;而西南地区的打箭炉等地成为新兴的“边茶”贸易中心,西藏地方所需的茶叶等大宗物品大多经此输入,加之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拨款等各类支援大多由四川承担,这使得西藏地方逐步融入进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世界”。^③应当说,经济上西藏由与西北的紧密联系转向依赖西南,是清朝以西藏为西北、西南边疆战略的重心由重西北转向重西南的基础。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作者简介] 陈鹏辉,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陕西咸阳 712082)

① 《清德宗实录》卷193,光绪十年九月丙午条。

② 姚锡光:《筹藏刍议》(全一册),《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二函,线装本),叶二。

③ 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笔者拟撰专文加以阐述,此不赘述。